

外交学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及近期研究议程

张清敏

内容提要 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为外交学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崛起使外交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中国外交学的研究状况反映了影响中国的外部因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外交成为热点的同时,中国的外交学研究面临着对象不清、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关系不明的状况。深化对外交学的研究不仅需要摆脱重视实力的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也需要理清外交学与对外政策研究的区别和联系。在明确外交学研究对象和体系后,国内外外交学研究近期可以在外交学说史、外交理论、当代外交实践和形式,以及区域和国别外交研究等方面取得成就。

关键词 外交学 对外政策 学科发展 研究议程

冷战的终结结束了东西方对峙对世界局势的制约。国际上新问题不断涌现,国际问题研究的议题不断增加,研究方法更趋多样化,催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也复兴了不少虽不年轻、但在冷战格局下并不受重视的学科。外交学是后者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冷战结束后,有学者呼吁应该“将外交学纳入研究视野”。^①进入新世纪以来,外交学得以“复兴”,^②外交学研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正如夏普(Paul Sharp)所说,“美国在重新发现,欧盟在创新,中国人在给它打上中国特

* 张清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① Raymond Cohen, “Putting Diplomatic Studies on the Map,” *Diplomatic Studies Programme Newsletter*, May 4, 1998.

② 参见本期斯图尔特·默里的文章。

色,甚至连塔利班也在进行思考”。^①的确,“研究外交学恰逢其时”。^②

如果说外交学的复兴在国际上源于国际体系变化所创造的机遇,其在国内的兴起则源于中国的崛起和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增加所引发的对以中国外交为代表的外交现象的关注。外交不再仅仅是领导人关注和处理的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自1997年外交学在大陆成为本科专业以来,国内不断有新的大学开设外交学专业,外交学在中国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外交活动的增加和对外交事务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学界对外交本质认知的加深和研究的深入。本文拟将外交学放在大的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框架下,^③结合这个学科的最新发展趋势,就外交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外交学作为一个学科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的区别和联系,外交学的内涵和近期议程等问题进行梳理并阐述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外部影响下的中国外交学研究

外交学在中国被边缘化是一个历史现象,反映的是中国国际研究所受外部影响来源的更替:早期中国国际研究学习的对象是欧洲,受其影响,外交学曾是中国国际研究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包括外交学在内的中国国际研究受苏联的影响,具有浓重的革命色彩。当今中国的国际研究受美国的影响,重视实力,忽视了对外交学研究。认清中国国际研究所处的历史和国际背景,有益于明白在当下的中国研究外交学的必要性。

外交实践起源于古代中东,当代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的研究则往往追溯到古代欧洲。格劳秀斯(Hugo Grotius)、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卡利埃(François de Callières)、威克福(Abraham de Wicquefort)、萨道义(Earnest Satows)、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等,这些外交学领域的巨擘,既是欧洲历史上外交活动的实践者,也是外交学的思想家。他们在欧洲外交实践的基础上创建和丰富了外交学的理论和思想,使之成为一个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政治的中心在欧洲,中国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也是西欧,外交学是当时中国国际研究的重点。在对民国时期“学术著作、教材和大学课程设置”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近期一份研究提出,“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形成于国际关系史学和国际法学的基础之上……是

^① Paul Sharp, “Diplomats, Diplomacy,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 716.

^② Jan Mellisen, “Diplomatic Studies in the Right Seas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 723.

^③ 本文用国际研究这个词从广义上包括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外交学或其他与国际问题有关的研究。美国的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下属的每一个分会都是国际研究这个大学科下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形成的。”涉及具体问题时,该研究提出,“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于 1902 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科,周鯨生先生在《近时国际政治小史》、《国际政治概论》中提出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目的、范围和发展趋势,认为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为一门新学科。”^①1930 年,当时的国民党中央为了培养外交事务专门人才,在南京红纸廊的中央政治大学设立外交学系,成为“中国最早”,“当时独一无二”的外交学专业。^②外交学专业的设立可以被看作是这个学科在中国诞生的标志之一。

对民国时期大学课程设置、主要期刊杂志等的梳理和分析显示,外交学是当时国际研究关注的三个焦点之一(另外两个是历史和国际法)。^③对建国前中国国际研究主要成果的考察也表明,在 20 世纪最初的 20 年里,中国国际研究方面的著作多围绕外交议题,30—40 年代多围绕具体的国际问题,很少或基本没有国际关系这样的词,也绝无当下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④从今天的眼光看,当时出版的不少外交学著作,不论是在体系结构、主要观点,还是他们所借鉴西方学术著作的规模和范围等方面看,学术价值绝不逊于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超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相关外交学著作。^⑤当时中国还没有国际关系这个概念,用当下流行“国际关系”这个概念来概括当时中国的国际研究状况,反映的是国际关系研究主导当今中国国际研究的时代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的对象转向了苏联。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提出,“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从前者我们可以采取一部分,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⑥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交观念和实践都深受苏联的影响。例如,在思想上强调外交的阶级性,认为“外交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强调外交的道德原则及正义和非正义性,否定历史上外交的虚伪性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认为“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

① 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11 期,第 43—44 页。

② 感谢台湾政治大学袁易教授提供的这一信息。有关早期外交学科的发展参见台湾政治大学网页上有关外交学系的介绍 <http://www.ocia.nccu.edu.tw/dep/pages.php?ID=dep1>。

③ 卫琛、伍雪骏、刘通《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第 43—44 页。

④ 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92—404 页。

⑤ 如蔡孝宽《外交论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廖德珍《外交学概论》,上海:大东书局 1930 年年版;杨振先《外交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上海:中华书局 1937 年年版;王卓然、刘达人主编《外交大辞典》,上海:中华书局 1937 年版。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 页。

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纳为一点:为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① 当今外交学中最为流行的公共外交,当时也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各国人民前替反人民的对外政策辩护,”“实际上是掩盖政府的真正目的和意图的手段和方法”。^②

在实践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曾经以阶级划分敌友,强调外交的革命性,在目标上忽视国家利益,突出国际主义义务。^③ 在人员构成、组织建设和国家关系上,从一开始就强调“另起炉灶”,突出外交的革命化,认为“外交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外交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④ 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伊始所奉行这种“革命外交”,^⑤与刚刚获得独立的美国对欧洲外交所采取的态度有许多相似之处,被现有的外交学理论看作是对传统外交的一种否定,被称为“反外交”(anti-diplomacy)。^⑥

改革开放后,国际问题研究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必要。这一时期中国学习的方向转向美国。虽然在向美国学习的时候,中国的国际研究仍然重视阶级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指导,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理论作为理论建设的目标。但是40多年过去了,这个目标并不能说已经实现;而美国主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却占领了中国国际研究的市场。一段时间,中国的国际研究言必称三大主义,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国际研究又被深深打上了难以抹去的美国烙印。

这个烙印中最深的痕迹之一,是对实力和国际关系体系层次理论的重视,以及对外交学和对外政策研究的忽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华尔兹(Kenneth Waltz)、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oehane)、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在中国的名望,是黎塞留、萨道义、尼克尔森等那些欧洲历史上的外交学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曾将外交学的衰落归因为通讯技术发展、外交价值贬低、议会外交程序复杂,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级格局中超级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垄断等。^⑦ 对于美国学界忽视外交学的现象,积极推动外交学研究的怀斯曼(Geoffrey Wiseman)做出了类似但更加系统的解释。他认为,第一,冷战期间美国的领导地位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177页。转引自周启朋、杨闯等编译《国外外交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② 苏联《外交辞典》第一卷关于外交的词条,转引自周启朋、杨闯等编译《国外外交学》,第59页。

③ 张清敏、李啟窳《中国对外政策思想根源探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2—18页。

④ 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⑤ John D. Armstrong,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ted Front Doctri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⑥ Paul Sharp, *Diploma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7-36.

⑦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6, pp. 346-351.

重依赖“实力、胁迫、情报等现实主义资源,而很少依赖外交技巧和说服等软实力资源”。证据之一是美国国务院地位的下降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几个经济部门地位的上升。美国军费开支不断膨胀,超过外交经费的数十倍,^①甚至美国军队内的乐队成员都远远超过美国外交人员的人数;^②第二,传统的外交与威慑战略所需要手段完全不同。冷战时期两级格局下美国所需要的是战略家和博弈理论家而非外交家;第三,在华盛顿特区的政府各个部门比美国驻外的使领馆有更多的涉外工作。希望在新政府谋到职位的学者们坚信,国内的决策和谈判比对外谈判即外交工作更重要;第四,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认为宏观决策更重要,更适合大国应对诸如柏林和古巴危机这样的危机。^③

出生于英国而任教于美国的夏普认为,传统上美国人总将外交与腐败的欧洲联系到一起,把外交看作欧洲欺负其他国家的“肮脏手段”,对外交有一种成见。美国在独立100多年后才派出自己的大使(在独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美国派出的最高外交代表为公使)。^④他还提出,冷战期间“多数国际关系研究者认为,外交工作对解释国际关系现象或理解国际关系并不重要。认为外交学过于专业化、神秘,而且早已过时”。^⑤因此,在国际研究非常发达的美国,外交学并非单独的一个独立学科,“外交通常被用作治国方略(statecraft),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同义词”。^⑥例如,基辛格的《大外交》一书使用了尼克尔森早期著作同样的书名,他和出版商在版权页对尼克尔森表达敬意的同时特别指出,虽然该书使用了尼克尔森《外交》的名字,但“其规模、意图和思想”与尼克尔森的著作有显著不同。^⑦美国也有几所学院的中文名字也有外交二字(foreign service 或 law and diplomacy),但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或偏重于国际事务,或者偏重于法律、经济等技能,即所谓的外交术,在主要的国际关系教材里除了外交史外很少谈到外交学。既然“老师”

① Earnest J. Wilson, “Hard Power, Soft Power, Smart Pow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Mar., 2008, p. 116.

② Walter Pincus, “Vast Number of Military Bands May Not be Music to Gates’ Ears,”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4, 2010; Daniel J. Wakin, “U. S. Military Bands: Lighter and Faster,”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 2010.

③ Geoffrey Wiseman, “Bringing Diplomacy Back In: Time for Theory to Catch Up with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11, 13, p. 711.

④ 2012年11月14日笔者与夏普教授在北京的谈话记录。

⑤ Paul Sharp,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Pauline Kerr and Geoffrey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2.

⑥ Elmer Plischke, “Treatment of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xt Books,” *World Affairs*, Vol. 135, No. 4 Spring 1973, pp. 328-344.

⑦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Simon & Schuster, 1994, p. 8, 该书在翻译成汉语时,书名改为《大外交》。参见(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Paul Sharp, “For Diplomacy: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1, 1989, p. 36.

眼中没有外交学,很少有研究成果,那么,作为“学生”的中国国际研究自然也就不会注重外交学研究,而是将精力放在了国际关系,并遵循其做法,把外交学当作国际关系的一部分。

外交学被忽视有其原因,而外交学的重生也绝非偶然。夏普认为,冷战结束和美国开始相对衰弱,美国国际问题研究对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施动者语言和文本解读兴趣的增加,以及对影响事情发展结果的兴趣的减弱”是外交学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①正如维基解密网所揭示的,大使馆内外交官所从事的“老式”外交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外交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衰退,尽管出现了远程会议、电子邮件和网络,但像驻外使领馆这样的机构恰恰更加重要了。

美国学界首先认识到了研究外交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研究学会(ISA)规模越来越大,人数增加很快,超越了美国国界,成为一个跨国学会。随着国际问题研究议题的增加,新的分会不断成立。在国际研究学会1996年圣迭戈年会上,一些研究外交学的学者提议成立外交学分会,次年该分会正式成立。外交学分会成立后积极推动在国际研究会的主要期刊上发表关于外交学的论文,出版相关外交学专著,并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创立了专门研究外交学的学术期刊——《海牙外交学研究》(*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该杂志设立在具有外交传统的荷兰而非美国,其刊物的编委会成员也来自世界各国,其构成比国际关系研究更具世界性,反映了外交学研究的广泛性和世界性。^②

学界对外交学研究的重视,很快在美国外交实践上得到反应。冷战结束以后,美国虽然强调“接触”战略的重要性,但仰仗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频频使用武力。到小布什政府时期,这种实力政策达到了顶峰。实践证明,对力量的过度运用不仅没有实现其对外目标,而是适得其反,严重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在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诺瑟(Suzanne Nossel)在2004年的《对外事务》发表文章,提出改变美国外交中对军事力量(所谓硬实力)的运用,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巧妙地利用一切国际资源和力量来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③这个思想得到学界和智库的积极回应。奈在软实力的基础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美国的国际和战略研究中心在2006年成立了巧实力委员会(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发表了《一个更加灵巧安全的美国》的报告,强调了外交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④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上获得提名的

① Paul Sharp, "Diploma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Other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Kerr and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p. 62.

② 参见该期刊的网页 <http://www.clingendael.nl>, 有关这个学科发展状况可参见本期默里的文章。

③ 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4, pp. 131-142.

④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7.

听证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奉行被称为巧实力的政策……巧实力外交将是对外政策的排头兵”。^①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改变了美国落实对外政策目标手段,在改变美国形象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效果。

有学者分析说,之所以提出巧实力的概念,是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有问题,需要修补”。^②这里说的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实施的正是外交,是对美国在国际上强调实力,忽视外交做法的反思,是对外交本质的回归。但习惯于依赖力量的美国,仍然不愿意放弃实力这个概念,而是实力前加上一个定语,把外交当作其中的一个手段,再次反映了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的美国特色和传统。

巧合的是,在美国对其过于依赖实力的对外政策进行修补,开始强调使用以外交手段为代表的巧实力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因为实力的上升使自己的海外形象得到改善,情况似乎恰恰相反。^③在“国际上特别是西方一些人指责中国外交强硬了,不像过去好说话”的同时,国内却存在着对中国相反的批评,指责中国外交过于软弱,“缺钙”,“主张‘亮剑’,要求教训一些国家”。^④任教于美国西东(Seton Hall)大学的华裔学者汪铮不无忧虑地提出了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困惑:“为什么在中国日益强大和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进反退?为什么中国综合国力越强大,尤其是军事力量越强大,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却趋于恶化?为什么中国崛起产生的不是向心力而似乎是离心力?为什么中国在一些周边争端中明明是有理的一方,却在国际舆论中完全处于被动?”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难道中国外交在重复美国的老路?外交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什么才是外交的本色?面对这些有关中国外交的争论,笔者认为弄清楚外交的本质、规律和特点也“恰逢其时”。

二、外交学研究的学科定位

人类社会活动本身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受人们认识能力所限,本为一体的现象才被分为不同的学科和领域,因而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分。一门学科的发展也是这样。一方面,随着一个领域研究的逐步深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进而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如化学中分离出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等;另

^① Clinton Says US Should Use “Smart Power” With Diplomacy, <http://www.wvenglish.com/en/voa/stan/2009/01/2009011429667.htm>.

^② Earnest J. Wilson, “Hard Power, Soft Power, Smart Pow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Mar., 2008, p. 110.

^③ Ingrid d’Hooghe, “The Limits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Europe: Beijing’s Public Diplomacy Puzzle,” *Clingendael Diplomacy Papers*, No. 25.

^④ 乐玉成《国际形势风云激荡中国外交乘风破浪: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在2011年中国外交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讲话》<http://www.mfa.gov.cn/chn/gxh/tyb/wjbxw/t888263.htm>。

一方面,一个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成果,因而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研究的深入又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这就催生了诸如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等跨学科领域。从历史渊源上说,外交学比国际关系的研究要更加久远,但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的兴起并成为国际研究的主流,外交学的研究逐步被边缘化,而随着此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又产生了将外交学作为单独学科进行系统研究新的必要。因此,要明确认清外交的本质、外交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需要弄清楚外交学的自身规律和特点,也需要厘清外交学与另一个与外交联系更加密切的对外政策的关系和区别。

从广义上说,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及外交学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国际关系有时也被称为外交。在前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关系史被称为外交史。从内在联系上看,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旨在增进和保护该国利益的,外交的职能也是进一步发展国家利益。对外政策和外交具有同一职能,对外关系或对外政策的总和也被称为外交,对外政策有时也被称为外交政策,在使用中也经常笼统地互换。但是,当今这个学科的发展表明,如果将这些笼统地当作一个整体,既不能满足外交实践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学科发展的要求,有必要对其进行区分并加以明确。

国际关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一般状态”。“它不仅包括国家间、国家集团间的各种类型和形式的关系和联系,也包括国际组织、团体、跨国公司等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具体来说,它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其中国际政治关系是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关系,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国际关系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国际舞台上为实现各自利益而积极互动各行为主体不断互相作用的运动过程。”^①国际关系研究作为一个学科在不同的时期和国家,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不仅具有地域特点,也有时代特点。比如,从改革开放到冷战结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以国际关系史为主,代表性成果是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主持并由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②在美国,对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的研究多属于历史学范畴,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随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代际更替,冷战后中国国际关系史学会也将其改名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名称的改变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从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转向以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为主,也标志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实现了从向苏联学习到向为向美国学习的转变。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是单层次的,不管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兴的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心理学等,在中国国内都有广泛和大量的译著和介绍。

① 钱其琛主编《世界外交大字典》,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页。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11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2004年版。

关于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与外交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国内外学界也进行了梳理。有学者指出,国际政治(关系)研究的是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的互动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能够告诉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压力;而对外政策关注的是某个具体国家参与国际交往时的动机、决策和行为由国家行为,回答了国家如何应对外部压力。^①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还将这两者的区别比作经济学中市场理论和公司理论之间的差异。^②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也提出,对外政策理论解释的对象是国家对待外部世界的意图、目标和偏好,而不是结果,因为一个国家的努力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所处的环境,尤其是其他国家的目标和能力。因此,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需要解释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国际现象和一般行为模式,比如,战争的不断发生,均势的反复出现或者霸权的交替等。作为对外政策理论需要解释的是某种具体国家动机和行为,比如,国家在怎样的条件下结盟或者何时选择扩张等。国际政治理论属于宏理论,而对外政策理论属于中层理论或局部理论。^③

就国际关系与外交学的区别来看,国际关系是行为体之间关系的状况和过程,主要在于揭示结构性特点;外交学也倾向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关注的是互动方式,如沟通、谈判、冲突的解决,相对倾向于对外交行为体运用这些方式时的手段、智慧和技巧。国际关系的行为状况既有和平的也有战争,而外交主要是和平的手段。国际关系探讨的是国家间关系的规律,外交学则既要研究规律,也要研究艺术。^④但是,不管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外政策的实施,都是在特定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国际关系格局是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外交规范变迁和外交形式改变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对政策分析提供了不同视角,外交学研究离不开特定的国际环境。

对外政策和外交学都是国际政治中一个行为体处理对其他国家关系过程中的单元层次行为,是一个联体双胞胎。明确外交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需要理清外交学与国际关系的区别,更需要把外交学与对外政策的关系理顺。对中国学者来说,首先需要从字面上将外交和对外政策区分开来。将“foreign affairs”翻译成外交,把“foreign policy”翻译成外交政策是中国国内比较普遍和习惯的做法。这虽反映了两者之间传统关系,但也显示出长期存在的对外交的模糊认识。随着外交学研究

① 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6页。

②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71-72; 转引自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6—117页;类似的分析还见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1—10页。

③ 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7页。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 6, No. 1, Autumn 1996, pp. 7-53.

④ 相关梳理还可参见高飞《我国外交学研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国际论坛》2007年1月,第34页。

的深入,以及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到了必须澄清两者关系的时候了。首先,把“foreign policy”翻译成“外交政策”不符合中文语法规则。包括国际关系、外交、对外政策,以及与外交活动有关的主权、国家利益等概念都是近代以来的舶来品。如果把“foreign policy”翻译成外交政策,那么“foreign policy”研究所包含的众多其他内容,如“foreign economic policy”“foreign military policy”,“foreign cultural policy”和“foreign aid policy”等对应的汉语就应该是“外交经济政策”、“外交文化政策”、“外交军事政策”及“外交援助政策”等。但这样的翻译不符合中国的语法逻辑。恰当的翻译是把“foreign policy”翻译成“对外政策”,而相关的词就可以翻译成对外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对外援助政策等。其次,与英文“diplomacy”所对应的汉语是“外交”。国内一些研究在解释“外交”的概念或翻译有关外交著作时,常常把“外交”理解为,外交是提出外交政策,或外交是制定或执行外交政策等,这种说法是在用同一概念解释自己,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第三,将“foreign affairs”翻译成外交,在实践上也造成了困惑。中国将中央政府的对外事务(foreign affairs)翻译成外交,而把地方和其他政府部分的“foreign affairs”翻译成外事。上述翻译,汉语可以理解,但再翻译回去就难以表达实际含义。此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联系日益密切,对外交往越来越多,对外事务越来越多,有些并非主权国家的外交范畴而是一般的外事,把“foreign affairs”翻译成外交,混淆了对外事务和外交的区别,把一些涉外事务都赋予了政治和主权属性,限制了非外交部门的能动性,赋予外交部更大的责任,是造成国人对外交误解和不满的一个原因之一。从这些意义上说,不管是为了理清外交学和对外政策的研究对象,还是为了推动对外政策和外交学的研究,“foreign policy”准确的翻译应该为“对外政策”,“diplomacy”译为“外交”,而“foreign ministry”最好的翻译是“外务部”。

对外政策和外交的概念完全不同,但是对外政策在国内常常被称为外交政策。中国学者对其理解大同小异:或认为“外交政策是实现一国在某一时期的特定外交目标的路线和方针”;^①或认为是“外交决策人”“根据本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利益,去创造、改变或适应外部条件,以实现本国利益所要求的目的”;^②或认为“外交实体,特别是国家在采取正式的外交行动之前做出的必要的决定”。^③这种把对外政策(外交政策)理解为一个有目的的行为的认识与西方理性行为主义对对外政策的理解是一致的。

相对而言,美国学界对“对外政策”也缺乏一致认识。传统对外政策的研究和理解是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把外交当作为特定目的采取的行动。如乔纳

① 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②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③ 金正昆《现代外交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森·威尔肯菲尔德(Jonathan Wilkenfeld) 指出, 对外政策可以被看作包括那些由主权国家为了在主权国家边界以外改变或创造条件(或问题) , 采取(或接受并随后做出反应) 的官方行动(和反应) 。^① 赫尔曼(Charles F. Hermann) 在列举了多种关于对外政策的概念后, 提出对外政策的三个要素, 包括选择目标, 动用手段实现目标, 以及落实政策。这样的理解显然把对外政策的落实即外交包括在对外政策范围内的。^② 但是, 在大部分情况下, 国家对外政策目的是不清楚的, 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是秘密, 因此, 对外政策研究的重点放在时空概念上非常明确, 可以看得见的对外行为。不再强调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 而是从影响对外政策结果的因素进行分析, 其核心是对决策过程进行探讨, 分析包括决策的内外环境、个人、决策机制和过程等对对外政策结果所产生的影响。^③

对于外交的概念界定, 西方学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理解。有人将外交学当作一种制度和过程,^④ 也有人将外交当作一种共同的文化,^⑤ 也有人将外交当作代表和沟通(represen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⑥ 国内外交学界较熟悉萨道义和尼克尔森等对外交概念的界定。前者认为, 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 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与附庸国之间的关系, 或者简单地说, 是指用和平手段来调节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⑦ 后者认为, “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 它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 外交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⑧ 中国学界将外交看作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 通过正式的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 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 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 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的重

① Jonathan Wilkenfeld et al.,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The Interstate Behavior Analysis Model*, SAGE Publication, 1980, p. 110.

② Charles F. Herman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That Which Is to Be Explained,” in Maurice A. East, Stephen A. Salmore and Charles F. Hermann eds., *Why Nations Ac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for Comparative Foreign Policy Studies*, Beverly Hills/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78, pp. 26-29.

③ Herman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That Which Is to Be Explained,” Wilkenfeld et al.,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Valerie M. Hudso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Alden and Ara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New Approach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④ Jozef Batora and Alan Hardacr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iplomacies: Europe, Asia,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Regions,” in Kerr and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pp. 300-318.

⑤ Geoffrey Wiseman, “Bringing Diplomacy Back In: Time for Theory to Catch Up with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p. 712-713 参见本期熊炜文。

⑥ Paul Sharp, “For Diplomacy: 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 No. 1, 1999, pp. 35-57; Christer Jonsson and Martin Hall, “Communication: An Essential Aspect of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2, 2003, pp. 195-210.

⑦ (美) 戈爾-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 杨立义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 页。

⑧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15.

要手段”。^① 这样的理解突出了外交的三个特性: 主权性、政治性及和平性。作为一个学科, 外交学是以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外交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是研究国家实行其对外政策的实践经验, 并探索外交行为规律性的科学”。^②

对外政策和外交学的兴起或复兴都始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研究会的外交学分会和对外政策分析分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在《海牙外交学研究》创刊的前一年, 对外政策分析分会成立了《对外政策分析》杂志, 成为两个分支学科的学术阵地。相对而言, 对外政策研究在美国的研究状况要好于外交学。只是在冷战期间长期力图建立一种系统的比较对外政策理论无果而终后, 从事对外政策研究的学者放弃了建立宏观比较对外政策理论的理想, 转而将对外政策研究重点和方向转变为对外政策的比较分析。它“研究的是国家或国家领导人, 如何制定、落实对外政策, 以及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③ 也有学者认为, “外交、情报工作、商业谈判和文化交流都构成了国家间对外政策实体的主要内容”。^④ 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 “从对外政策分析的角度看, 外交既是对外政策的输入 (input) 也是对外政策的输出 (output)。作为对外政策输入的外交, 与影响对外政策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其他因素有关, 例如, 一个实体向另一个实体发出的外交信号。” “作为对外政策输出的外交”, “是一个行为体对外政策工具箱中许多工具中的一个工具”。^⑤ 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 对外政策分析往往将外交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不少国内的外交学著作也将不同国家典型的对外政策当作外交学研究的一个方面。^⑥

但是, 作为两个分支学科, 对外政策和外交学之间也有着显著不同, 理清两者关系是外交学研究所面临的首要议题。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的开篇提出, “外交这个词虽然在英语中存在不到两个世纪, 可是它曾遭到滥用或被混淆。比如说, 有时它被用作对外政策的同义词。但对外政策是政府制定的, 而不是由外交家们”。^⑦ 尼克尔森也说, 导致将对外政策和外交学混淆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公众没能将问题的“立法”(legislative) 方面和“行政”(executive) 方面区分开。“在民主的国家‘对外政策’当属内阁在人民选举的代表许可的下决定的事, 而实施这个政

① 鲁毅等主编,《外交学概论》,第5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③ Philip B. K. Potter, “Methods of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www.isanet.org/fpa/2007/06/fpa-section-cha.html, accessed Aug. 26, 2009.

④ Chris Alden and Amnon Ara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New Approaches*, p. 1.

⑤ David Griekemans,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 716.

⑥ 廖德珍所著《外交学概论》中的主要两章分别阐述“世界外交主义”与“最近列强外交政策”;杨闯主编的《外交学》在原有的《外交学概论》基础上增加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政策”,参见杨闯主编《外交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⑦ (美)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1页。

策,不管叫它‘外交’还是叫它‘谈判’一般应留给有经验和授权专业人士。”^①他还明确提出,“外交不是一种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不是一项宗旨,而是一种方法。外交是落实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但非唯一手段”。^②有关外交软与硬的争论,实际上是混淆了对外政策和外交学两个不同概念。

正因为外交被普遍认为是一国实施其对外政策的工具或手段,有关外交的定义都不涉及一国奉行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在冷战期间,虽然东西方在对外交的认识上有很多的不同,但在将“外交作为国家对外政策重要手段”这一点的看法完全一致。前苏联学者认为,“外交是作为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和任务的国家活动,不是这一政策的唯一手段……外交是实现对外政策的和平手段,它的基本方法是谈判”。^③有印度学者提出,“如果对外政策的首要功能是做出对外关系的决定,外交的首要任务则是恰当地执行它们”,“当对外政策更多地关注决定时,外交则主要与它的执行相关”。^④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外政策的制定者频频登上外交舞台的前台,成为对外政策的实施者,成为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增加了区分外交学和对外政策的难度。

将外交学与对外政策区别开来,也是中国外交学研究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杨振先在其《外交学原理》一书的开始就对此进行了探讨。他说,“外交政策者,一国所决定的方针。常依世界局势及各国国情的不同而随之差异。”“外交学者系以研究使用智略,办理国家对外事务为主旨。”“办理国家对外事务,必先有一定的方针……即国家所决定的外交政策也。”“外交政策者系外交学之先行,而外交学乃辅佐外交政策的决定。外交学研究的主要范围,系外交机关,并说明此项机关如何进行外交事务,而外交政策的决定,则为此项机关的主要事业。”^⑤当代中国学者也有同感地指出,“所谓外交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同外界打交道时的政治,办外交时依据的政策便是外交政策(即对外政策 foreign policy,笔者注)”。^⑥“没有这一(外交)手段,外交政策难以实施,而没有外交政策,外交也不成为其一种手段。”^⑦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的方法很多,既有战争的方法,也有和平的方法,外交属于后者。虽然传统上我们将外交队伍称为“文装的解放军”,但在和平时代不能期

① Harold Nicolson, *Diplomacy*, p. 12.

② Harold Nicolson,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 Study Allied Unity 1812-1822*,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46, pp. 164-165.

③ (苏)瓦·亚·左林《外交和外交工作》转引自周启朋、杨闯等编译《国外外交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④ (印)萨曼德拉·莱·罗伊《外交与对外政策》转引自周启朋等编译《国外外交学》,第211—212页。

⑤ 杨振先《外交学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页。

⑥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⑦ 鲁毅等主编《外交学概论》,第3—4页。

望外交人员扛起武器打仗,因此用软硬来评价中国外交本身违背了外交的本质。

对外政策研究者和外交学研究者可能研究同一问题或事件,但是两者提出和回答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外政策研究可以回答实证问题,例如,一个国家对外另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什么?也可以回答规范性的问题,如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是否有道义责任,或是否明智采取一种政策?也可以是评价性问题,如一项政策在实施中取得了什么成绩,是否失败?为什么?外交学研究提出和试图回答的实证性问题,例如,国家之间是如何通过传统方式,如在双方首都之间互换大使,或通过其他公开和私下的方式代表自己的观点和政策?它们是如何沟通的,在实现它们各自目的时它们之间的沟通有效性程度如何?也可提出和回答规范性的问题,包括道德性问题和工具性问题,如传统的外交谈判方式,通常是在秘密进行的外交谈判,在道德上应遭到反对的吗?也可以是评价性的问题,如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列宁在20世纪早期所主张的“公开”外交方式在实现谈判者所追求的目标方面更加有效吗?等等。^①

三、外交学研究的议程

外交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研究,涉及谈判交涉、办案调研,政策的具体实施和落实等,对语言交流、礼宾礼仪、迎来送往等技术能力有相当高的要求,大多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学习和掌握。当今大多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都没有外交实践经验,这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制约外交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是,成功的外交绝非仅靠经验。从萨道义对外交所做的定义即“运用智力和机智(tact and intelligence)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来看,办理外交需要两个条件:智慧和机智,即学理和技术。外交的成功除了实践性强的技术外,更需要智慧和理论。早期的从事外交学研究的学者都有相当论述。如杨达人援引法国外交学家的观点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精辟的阐述。他说,“外交其所以为科学者,因其需要无限度之高深学识,类如国家与国家之司法的政治的关系,彼此利害之传统关系以及各种约款之规定,非学莫济;其所以为技术者,固因其目的在处理国际案件,设法办理政治之交涉也”。^②顾维钧在为民国时期出版的《外交大辞典》所作的序中也提出,“外交故不能脱离事实,尤不能脱离学理,前者为外交术,后者为外交学。无外交学则不能有外交术。学理与技术,盖外交前进之

^① Geoffrey Allen Pigman, “Debates about Contemporary and Future Diplomacy,” in Kerr and Wiseman, *Diplomacy in a Globalizing World*, pp. 72-73.

^② 杨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5页。

“双轮也”。他还说,“现代外交知识在欧美各国为国民必备之常识,而关系国家利益国际和平者,又莫不专心致志,深思力学。盖根据事实,认清事实,非得力于理论之探讨,文化之传播不为功”。^①

当今外交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由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也有供这个共同体的学者互相沟通和交流平台即学术杂志。随着研究的深入,外交学的学科体系也在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的外交学体系包括外交学概论、外交人员概论、领事、国际交往和国际组织等内容。^② 尼克尔森的《外交学》有十章涉及:正规化外交的起源、外交理论的发展、从旧式外交向新式外交的转变、民主的外交、思想的外交家、欧洲外交的几种类型、最近外交实践的变迁、外交程序要点、外交官制、外交用语等。^③ 除了一些专门性的研究外,近年来出版的比较系统外交学著作和论文集也反映了外交学学科体系的内涵。例如,2004年出版的《外交学》论文集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有关外交学不同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编者将其分为三卷。第一卷是外交理论,第二卷关于外交历史,第三卷所涵盖内容主要涉及当代外交的发展和涉及问题。^④ 新近出版的由世界不同国家学者参与编写的《全球化时代的外交学:理论与实践》则包括几个大的方面:外交的进化;外交的概念和理论;外交的机构、过程和手段;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交等。^⑤

中国学者在对外交学进行研究的时候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外交学学科体系的理解。刘达人在其所著的《外交科学》一书中曾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看法。他认为,“国际外交现象是非常复杂多端的,从外形而内容,从内容而本质,这些课题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之所能彻其究竟;所以‘外交科学’当立于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之上,将外交科学各部分的知识完全整理在一个体系之下,用科学的方法,从纵的(已然)横的(现然)规范的(应然)各方面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确立外交科学在一般科学中的基础”。^⑥ 纵向的已然,包括外交通史、外交分史、外交段史、外交政策史、外交思想史、外交进化史等。横向的现然,即包括一般学科、外交学、外交机构、外交权与控制权、外交行政、领事制度、外交政策,也包括特殊的国际关系及其背景,国际组织、国际政治、国际条约、国际会议、国际立法等。规范的应然则包括,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作为外交的道德的指导原理哲学。外交学的外延包

① 杨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1页。

② 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1页。

③ Nicolson, *Diplomacy*.

④ Christer Jonsson and Richard Langhorne, eds., *Diplomacy, vol. I Theory of Diplomacy, Vol. II, History of Diplomacy, Vol III, Problems and Issues in Contemporary Diplomacy*, London: Thousand Oaks an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2004.

⑤ Kerr and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⑥ 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1页。

括经济(金融)、文化、科技、体育、语言等。^①新中国的第一本外交学教材《外交学概论》较多吸收了尼克尔森和萨道义关于外交的体系。近期出版的《外交学原理》从外交学的理论、制度、过程和形态几个方面构建了自己的体系。^②从国内已有的关于外交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不少领域内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若和国际学术界的比较而言,中国的外交学研究近期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取得突破。

第一是外交史。政治科学乃历史之果实,历史即政治科学之根基。^③政治科学如此,作为政治学科一分支的外交科学也是如此。研究外交学,需要对其演变有所了解,厘清外交形态和外交学科发展的历史,以及外交之所以然的状况。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外交学史(history of diplomacy)与传统的外交(政策)史或国际关系史有明显区别。后者是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间关系互动的历史,而外交学史“是关于作为实现对外政策手段的外交思想、实体,以及外交的形式、来源的发展历史”。它“解释什么是外交,其特性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它对理解外交机构的功能以及外交行为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这种机制的需求之间的关键关系方面非常重要”。^④

国内有关外交学的研究多是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内容,结合当代外交的一些实践进行阐述。但该公约是1961年签署的,两年后生效。新中国是在1975年才签署加入的。从学理上看,当今外交形态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从历史角度正本清源,才能深入对外交学的理解。例如,虽然外交这个词被认为是来源于古希腊,但是其最初并非当今的含义,只是经过漫长的演变,直到1796年才开始有现代外交的含义。^⑤又如,从外交规范上说,主权国家是外交产生的基础,在对主权的认识上经历了君权神授、人民主权,以及当前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的争论等不同阶段。每一次观念的变化都改变或动摇了整个外交的基础。至于当今外交特权与豁免原则的形成,使馆制度的变迁,外交规范的兴替,外交手段和方式的更新,对外交官的要求变化,礼宾礼仪的全球化等等,无不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演变过程。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以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没有一个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一个学科的形成。

具体来说,尼克尔森接受了将外交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的做法,他认为,476—1475年为第一阶段,1473—1914年为第二阶段,1914年以后为第三阶段。^⑥有关外交起源的有限著述认为,现代外交肇始于古希腊经历古罗马,到中世纪后期(15

① 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二节,“外交科学之体系”,第17—24页。

② 赵可金《外交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第31页。

④ Jonsson and Langhorne, eds., *Diplomacy, Vol. II, History of Diplomacy*, p. 1.

⑤ (美)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1页。

⑥ Nicolson, *Diplomacy* p. 35.

世纪)形成于意大利北部,16世纪扩展到欧洲中部,17世纪扩展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以及扩展到俄罗斯等欧洲的边缘;18世纪扩展到拉丁美洲及美国;19世纪后半期经过最初的拒绝后到扩展到中国、日本、朝鲜和奥托曼土耳其,最终形成了全球的外交系统。这种观点反映了外交学研究中西方中心的事实。以色列学者科恩(Raymond Cohen)指出,“英语国家的外交史学家从古希腊开始,因为他们对古希腊的经典比较熟悉,对古代近东的文本缺乏了解。古希腊的外交很有意思自有其道理,有时也是现代外交的开始。进入现代以来,学者们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们发掘了大量的历史经验和先例。古希腊外交将米索不达米亚和古欧洲联系起来”。^①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将外交的历史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建立的众多城邦。

新中国的第一本《外交学概论》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将外交史划分为古代外交、中世纪封建国家外交、资本主义国家外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外交”,以及无产阶级外交。其外交发展史部分相对比较薄弱,重点是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外交的阶级分析。国内其他外交学教材回避了这部分内容。如果历史是外交学研究的基础,对外交演变史的研究则是中国外交学研究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最容易取得成就的领域。

第二个议程是关于外交学理论建设。历史研究在于弄清楚外交是什么,当代外交的本质、形式和手段是怎么发展形成的。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则是对外交学本质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外交学理论中国化的问题,改革开放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理论往往和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作为共同目标。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之间的区别还没有很好地理清,外交学研究依附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情况下,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尚没有取得公认成果,更谈不上外交学理论建设了。

制约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之一是对理论概念的模糊理解。国内学者将理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解释性或知识导向的理论,二是作为政策指导性理论或实践性导向理论。^②中国学界在谈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所用的概念往往是美国学术界所使用解释性理论,而在中国政治环境下的理论更多的是指作为政策指导的理论。我们在讲到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往往把西方解释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标杆,试图建立一种指导实践的理论。从学理上讲,国际关系理论、对外政策理论(或分析模式)大多是解释性的,知识导向的;而外交学理论则属于后者。尼科尔森认为,外交理论是指“被普遍接

^① Raymond Cohen, “Diplomacy through the Ages,” Kerr and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p. 21.

^②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7—19页;Qin Yaqi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ume 7 2007, pp. 313-315.

受的关于国际行为和谈判的原则和方法的思想”。^① 夏普借用贝尔的观点提出,“外交学理论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外交学家和研究外交的学者的主要思想,这些思想帮助我们思考外交和国际关系”。^② 国内有限的几本关于外交理论或外交思想的书籍都支持了这样观点,因为它们阐述的都是主要外交家关于外交的思想。^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建立外交学理论要比国际关系理论容易,因为中国并不匮乏这种理论,只是需要将两者从概念上区分开来。

当然,有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或思想,不能局限于中国,更不应该局限于当代中国。新中国的外交学思想自然应该是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的重要一部分。但是,有中国特色外交学理论体系应该将中国以前的,远者如春秋战国时期丰富的外交思想,^④近者如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外交思想,如顾维钧的外交思想,^⑤当代如新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思想,^⑥等都纳入这个理论体系之中。此外,也要将西方国家外交思想家的思想纳入其中,毕竟当代外交实践源于西方,西方在外交思想方面具有更加丰富的资源。这样的理论不仅仅是逐一阐述个别外交家或外交学者有关外交的思想,或按照某一标准对某些思想进行某种政治导向的诠释,而且要从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揭示其对外交本质的认识,辨析其公共点和差异,抽象出更加理论化的体系和框架,并按照这种体系和框架进行分析。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摆脱是非观念和道德与非道德的框框,从学术的角度一视同仁,客观看待一切研究对象。

第三,当代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的发展。外交是最有活力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根据社会科技的进步和世界格局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如电报产生后,有人提出外交行将结束,但外交并没有结束,而是变得更为活跃,并赋予外交时代特点。网络出现后,又有人提出外交行将结束了,但外交也没有结束。全球化时代外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出现了大外交或综合外交的概念,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外交形式。如方式上的双边外交与多边外交;从领域划分的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科技外交、体育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等;从主体和客体看的首脑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公众(民间或人民)外交、二轨外交等;从手段来看强制外交、威慑外交、预防外交、穿梭外交、秘密外交等。

从中国国内的情况看,随着中国外交实践不断发展,在某些外交形态和方式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如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对外经济交往的活跃,经

① Nicolson, *Diplomacy*, p. 35.

② Sharp, *Diploma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6.

③ 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富春、张学斌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英〕贝里奇等著《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庞中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⑥ 谢益显《中国外交思想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济外交成为学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既有一些以日本为例的历史性或描述性案例研究,也有关于系统化的理论梳理和分析。^①随着政府对公共外交的重视,公共外交研究也成为—个热点。近年来的学术论著等增长非常迅速,而且还有了《公共外交季刊》这样的学术刊物。随着其他领域外交的活跃,或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有一些时效和学术性都比较强的可喜成果。^②作为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外交学自然需要与时俱进,密切联系中国外交的实践,但是中国学界有关外交的研究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是描述性多,理论化程度不高;二是对别国研究的深入客观,对自己的研究则政策性强、学术性弱,或者只研究其他国家,不研究自己;三是功利性太强,一旦某一方式成为热点,便蜂拥而上,缺乏理性、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当然有些问题可能短期内并不能解决,但从学科发展来说,中国外交学的兴起不仅有赖于更多成果,也需要提高研究学术水平和质量。

面对外交实践发展对外交理论提出的挑战,中国外交学研究在注重对不同形态外交进行研究的同时,也需要思考不同形式外交的共性和时代特点。目前,中国学界基本上还是采用传统的对外交的理解来解释这些外交形态,尚无新的框架或范式从理论高度把握这些共性或新特点。而把外交看作制度、共同文化、代表和沟通、社会关系等概念,都是从不同视角分析和看待当代外交发展。

第四,不同地区外交的特色。当代外交发展经历了由西至东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西方把自己关于外交的规范和方式推广到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过程,也是西方吸收世界不同地区和文化智慧的融合过程。外交学的主要概念,包括主权、国家利益、特权与豁免、谈判原则、外交规范、从秘密外交到公开外交为代表的外交形式等,都源于西方。但是在当今外交实践规范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东方国家提出的,这种原则本身具有地域性特点。这也是为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在对主权观念和干涉内政等具体外交实践的理解上侧重点仍然有着差异。在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突破,开始执行共同的外交和货币政策的时候,东方的一体化进程仍然裹足不前。不管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内部的协商一致原则,还是东亚地区所奉行的东盟模式(ASEAN WAY)与西方观念均有所不同。^③这些地区性原则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不仅当今的外交学研究需要有全球性视野,对外交学说史的研究也需要注重不同国家和文化外交方式的区域性特点。例如,在中世纪后期外交学史上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拜占庭外交就是在吸收了各个地区和文明外交的基础上形成的:

① 周永生《经济外交》,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② 夏丽萍《领事保护机制改革研究:主要发达国家的视角》,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赵可金《当代中国外交制度的转型与定位》,北京: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③ Jozef Batora and Alan Hardacr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Diplomacies: Europe, Asia,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Regions," Kerr and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pp. 300-318.

“拜占庭外交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和基督教那里获得了方法和思想。从美索不达米亚那里,它继承了一个家庭王国的概念(皇帝是他们的父亲),通过皇室之间的联姻来加强联盟,高雅的礼仪和好客,通过商人一大使来发展贸易。从希腊人那里,它继承了用华丽的言辞进行谈判,以及用软实力和他们对拜占庭文化的崇拜来影响地方代理人。从罗马人那里,他们学会了分而治之的策略,用金钱雇佣同盟(为它打仗),收买麻烦制造者,用宏伟的朝廷让来访者敬畏,以民间工程项目的方式向盟友提供援助。从基督教那里,它坚定了自己具有至高无上合法性的信念,规划异教徒并成功地将他们转变为君士坦丁堡的盟友。”^①

对于外交的区域性特点,中国有切身的体会:受欧洲影响,中国重视外交;受苏联影响,我们给外交增加了革命特色;受美国影响,我们重视实力。在美国重视实力、忽视外交的时候,一些小国家没有放弃外交,支撑起了外交学学科的发展。当今在美国为外交学的发展摇旗呐喊的几个学者,或者来自英国,如夏普,或者来自澳大利亚,如威斯曼。美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但是其忽视外交的对外交往方式则不值得提倡。因此,外交学研究应该避免盯着美国的陋习,而应具有全球眼光。当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崛起也自然将外交学研究吸引到亚太地区。梅利森(Jan Melissen)在展望外交学研究的前景的时候也提出:第一,外交学的研究要超越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的视野,借鉴更多的学科。第二,要超越以西方为主和西方主导的局面,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外交实践活动应该被纳入其中。^②

重视日益活跃的当代中国外交并进行研究,不仅是推动外交学发展的应有之理,而且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对外交实践和外交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其在世界上地位不相称。在全球化的今天,外交学复兴之际,中国学者应当从历史高度看待外交学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吸取仅仅依靠实力办外交的教训,按照外交学的规律办外交;以全球视野看待和评价外交,而不是以某一个国家和地区为学习和效仿的中心;以开放的心态研究外交,将中国外交放在大的全球化时空背景下,把中国当作一个普通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外交学复兴过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元素,在外交学发展上“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迹”。

^① Raymond Cohen, “Diplomacy Through the Ages,” in Kerr and Wiseman eds., *Diplomacy in a Globalized World*, p. 23.

^② Jan Mellissen, “Diplomatic Studies in the Right Seas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3, 2011, pp. 724-725.

FOCAL TOPIC: The Revival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Diplomatic Studies

The Position , Object of Study , and Short-term Agenda of Diplomatic Studies in China *Zhang Qingmin* (3)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has ushered in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the revival of the study of diplomacy. China’s rise has brought diplomacy to the forefront of China’s domestic political agenda. The situation of diplomatic studies in China reflects changes in external factors that have had an impact on China , and bear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While diplomacy has become a central issue in China , diplomatic studies face some immediate problems , such as the vagueness of the object of study , and the confusion of diplomatic studies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It is imperative to free the study of diplomacy from the power-centered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nd to sort out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it has with th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clarifying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its system , short-term progress can be made in such areas of research as diplomatic history , diplomatic theory , contemporary forms and practice of diplomacy , and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diplomatic studies.

The Renaissance of Diplomatic Theory *Stuart Murray* (23)

When traditional diplomacy was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diplomatic theory and theorists were invaluable in overcoming a period of confusion as to what diplomacy was or ought to be. Similarly , the modern diplomatic environment with its mixture of state , non-state and rogue diplomatic actors is equally puzzling. Charting the historical and moder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plomatic theory and diplomatic practice ,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uch confusion is a sign of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naissance in diplomacy. In order to make sense of and explore the full potential of diplomacy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iplomatic studies needs to move beyond its culture of resistance to theory and embrace the idea of general and abstract theorizing. The complex study of diplomac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Traditional , the Nascent and Innovative Schools. This alludes to the remarkable collection post-Cold War writing and thinking on diplomacy; it demonstrates that our modern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business of peace” is only just beginning.